

●任乃荣 著

*Sanhuang Wudi
Tanyuan*

三皇五帝

探源

新华出版社

任乃荣 著

*Sanhuang Wudi
Tanyuan*

三皇五帝
探 源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皇五帝探源 / 任乃荣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2

ISBN 978 - 7 - 5011 - 9539 - 8

I. ①三… II. ①任…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三皇五帝时代

IV. ①K221.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9483 号

三皇五帝探源

作 者：任乃荣

责任编辑：李 成

装帧设计：王小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印 刷：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5

插 页：8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539 - 8

定 价：35.0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前 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殷墟发现甲骨，以及李济先生在夏县寻找夏墟，这算是我国田野考古事业的发端。在此基础上，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考古工作者继续开展了夏文化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郑州商城的发现，偃师商城的发现，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的发现，登封禹都阳城遗址的发现，促成了上世纪末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成功。这项成果，将我国的纪年历史由“共和元年”向前推进了一千二百年。这对于我国的古史重建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我国夏以前的历史是否存在？“三皇五帝”是否属实？要知道，如果我国的文明史定格在自夏开始，那么就只有四千年！这与我国从古到今的传统认识：“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不相称的。所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继续作了不懈的努力，使这方面的研究事业有了更加突飞猛进的发展。田野考古工作多处展开，遗迹遗址层出不穷。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黄河流域发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后，五六十年代发现了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七十年代在江南发现了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湖南彭头山遗址、玉蟾岩遗址；在黄河流域又发掘了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八九十年代又发掘了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等等，从而揭开了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的神秘面纱，惊现了八九千年前的原始宫殿、农作物种子和刻划文字符号。这不仅大大前移了我国文明发轫的时间，而且拓宽了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源头的视野。中华文明决不止五千年！中华文明也不是一个源头孕



育起来的。这些遗迹遗址，按照科学测定的年代，形成了考古文化类型序列谱系，与古史籍记载的“三皇五帝”相对应，得到了互相印证。这就为我们的上古史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从事上古史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论文论著大批涌现，而研究当中涉及的学术领域也愈来愈广：考古学、类型学、层位学、文献学、文字学、海洋水文学、地理地名学等等。学术领域的广泛涉及，将使上古史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更加可靠的基础上。特别是新一代史学家王大有先生，他在上古史研究当中除运用了上述各学科知识外，还参考图腾徽铭学、天文星象学、甲骨文金文陶文破译学等领域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在众多新老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国的上古史框架已基本形成，脉络大致清晰。最近三十年的考古和古史研究，胜过已往的三千年！

三代断代工程之后，2001年至2003年，我国接着开展了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的攻关，现已完成。之后，将要全面启动大型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这些成果，老一辈史学家功不可没。苏秉琦先生，不仅奠基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而且提出了“重建中国古史”、“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奋斗目标。他的史前史框架构想，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国上古文化的纲。他为我国重建上古史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事情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方面。三代断代工程的成果，还没有体现在历史教科书和历史专著中。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原始社会”一章中，写到“三皇五帝”时代时，题目是“传说中的原始社会”、“五氏传说”、“五帝传说”。由高教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大专院校教材《中国古代史》，在第一编“原始社会”中。写到“三皇五帝”时，题目是“传说时代”。夏、商、周初，仍无纪年。这就是说，三代断代工程的成果，还没有向全国读者普及。再一方面，正是由于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上古史的研究，纷纷著书立说，而由于占有的史料不同，或观点不同，或别的什么原因，致使对同一历史人物、遗迹遗址或历史事件，做出了不



同的考证结论；互相之间又缺乏沟通，更未组织集体研讨，各执一词，不能取得共识。甚至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在什么时候？中国的农业起源于什么时候？中国的人工用火起源于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字起源于什么时候？中华人种起源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等等。这些问题得不到个准确的结论，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势必影响我国的古史重建工作，更影响世界各国对我国的文明史的承认问题。另一方面，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如炎帝、黄帝的发祥地究竟在哪里，竟有十多个省提出炎帝或黄帝发源于他们省。又如尧、舜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哪里？也有很多省提出是在他们那里。这首先可能与古史文献的记载有差异有关，也可能与学者对考古发现的认识不同有关；但也不排除，有些地方的学者文人，掺杂了一些地方观念、功利思想，“援圣贤以自重”，著书立说是为提高自己所在地域的知名度，或创文化品牌，开发旅游资源。但是这样一来，就弄得是非混淆，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及其时间地点，真假莫辨，使人无所适从。这种混乱现象对于我们的古史重建工作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但我自小酷爱考古事业，看到三十年来我国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成绩斐然，我异常振奋，以为重建上古史大有希望。但是面对当前的混乱局面，我又深感遗憾，以为这又是我国重建上古史的巨大障碍。为了理清“三皇五帝”的历史脉络，调查分歧从何而来，十年间，我通读了先秦有关典籍和汉、晋、唐、宋的有关重要文献，还走到了全国东西南北，看遍了“三皇五帝”的二十余处陵庙，考查了这些陵庙的兴废史、祭祀史。我尽可能多地实地考察了一些文化遗迹：西至大地湾，东至将军崖，北至涿鹿黄帝城，南至九嶷炎陵，西南至“红崖丹书”，东南至会稽河姆渡。我尽可能地阅读了当代专家学者的考古论著和重要遗址的发掘报告，目的是提出意见，或可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添砖加瓦，尽一分绵薄之力？

目前，我国在许多领域都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在对历史的研究与



总结方面也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但若按编年历史，则中国只有四千年；而外国承认的则只有三千多年，或者不到三千年。这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重建上古史，刻不容缓！重建上古史的事业，应该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完成，决不能推给下一代。我们应有使命感和紧迫感。我们一定要通过三皇五帝的研究考证，将中国上古史与年代学结合起来，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追寻与探索中国六千至七千年的文明历史的源头。让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辉煌的成就，展示于世人面前！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1)
第一节 从疑古思潮的阴影下走出来	(1)
第二节 正确理解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6)
第三节 充分发挥古代文献典籍的重要作用	(9)
第四节 要高度重视考古发现在上古史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	(21)
第五节 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	(32)
第六节 当前学术界的混乱局面应当扭转	(37)
第二章 华夏文明肇启于伏羲时代	(43)
第一节 中国的上古史为什么从伏羲写起？	(43)
第二节 中国的文明史为什么不能从燧人氏写起	(50)
第三节 太昊伏羲源流及其考古学证据	(54)
第四节 太昊伏羲的历史地位、世系传承、年代界定	(58)
第五节 太昊伏羲都宛丘、葬于陈考实	(64)
第六节 伏羲画卦将中华文明推向第一个高峰	(68)
第三章 炎帝神农氏时代	(70)
第一节 炎帝神农氏的称谓	(70)



第二节 炎帝神农氏源流及主要活动地域	(74)
第三节 炎帝世系及炎帝断代	(86)
第四节 《神农本草经》将中华文明推向第二个高峰	… (91)
第五节 “红崖丹书”是炎帝的族谱吗?	… (95)
第四章 黄帝轩辕氏时代	(100)
第一节 黄帝源流	(100)
第二节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105)
第三节 黄帝世系	(109)
第四节 黄帝崩葬	(114)
第五节 黄帝的年代	(119)
第六节 《黄帝四经》将中华文明推向第三个高峰	… (122)
第七节 黄帝功德永垂不朽	(129)
第五章 少昊金天氏时代	(132)
第一节 先秦典籍对少昊金天氏的记载含混不清	… (132)
第二节 少昊金天氏的考古学证据	(135)
第三节 将军崖岩画的启示	(138)
第四节 少昊族源	(141)
第五节 少昊的年代和崩葬	(143)
第六章 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时代	(145)
第一节 颛顼高阳氏时代	(145)
第二节 帝喾高辛氏时代	(153)
第七章 帝尧陶唐氏时代	(166)
第一节 帝尧的身世及践位	(167)
第二节 帝尧的主要活动地域	(169)
第三节 帝尧的光辉业绩	(178)
第四节 尧庙、尧陵考实	(185)



第五节 帝尧的年代	(189)
第八章 帝舜有虞氏时代	(191)
第一节 帝舜的身世、主要活动地域	(192)
第二节 帝舜的崩葬与舜陵之争	(199)
第三节 帝舜的历史贡献及其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205)
第九章 伯禹夏后氏时代	(215)
第一节 伯禹夏后氏源流	(215)
第二节 伯禹夏后氏业绩	(219)
第三节 禹都阳城	(222)
第四节 伯禹之崩葬与伯禹之年代	(224)
第五节 尧舜禹的年代与“三代”年代的衔接	(227)
参考文献	(231)



第一章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在考察与重建上古史的工作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要排除的思想障碍不少。要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前提和关键是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求以文献典籍为依据，以考古文化为证据，辅之以其他方面的实证，要几方面并重，互为验证；切忌片面肯定一个方面的作用而忽视或否认另一个方面的作用。辨证的方法，要求对于史料和考古证据，必须全面系统地、融会贯通地、有分析有对比地使用；切忌孤立地、机械地使用，比如那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等形而上学的做法。科学的态度，则要求著书立说，或宣布成果，或作出结论，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恰如其份，力戒浮夸，言过其实。特别要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胸有全局，把视野拓展到全中国大地，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出发点和立脚点。切忌囿于一隅，坐井观天，更不可掺杂地方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对文献典籍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甚至篡改原文，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因为这一系列的态度都是不利于上古史研究的。

依照上述原则，结合当前学术界实际，提出几个主要问题剖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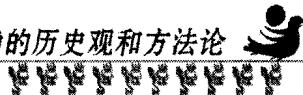
第一节 从疑古思潮的阴影下走出来

我国考古界的一些思想混乱现象或者说意见分歧，根源之一，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是多种多样



的。它不仅表现为否定我国的上古史存在，不承认古史典籍记载，否认上古神话和传说作为历史载体的作用，将之一概斥为荒诞不经；还表现为不承认当代考古新发现与史籍记载相对应能还原上古史，而是认为“只有当时的记录才有价值”，只有挖掘出了炎帝或黄帝的遗物，才能作为证据。因此便认为：现在研究三皇五帝上古史，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还不具备。这些思想，显然阻碍着古史研究工作取得成果。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分析认识疑古思潮的危害性，肃清其影响。

疑古思潮并不自今日始，而是自古有之，自战国时代就已开始。战国时代是我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时代。诸侯之间矛盾尖锐，征战激烈，“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诡诈”，“苟以取强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当他们把炎黄、尧舜作为自家学说的立论根据时，就有褒有贬，或利用或改造。韩非子不相信尧舜之道并贬损尧舜之道。他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能复出，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他还说：“天下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有弑君，有曲于义。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也。”他还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庄子认为黄帝尧舜都是追逐功利，迷惑了真性，违反了自然禀赋。他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商鞅对儒家思想大加挞伐。他认为“诗”、“书”无益于国家治理，相反是富国强兵之大敌。他说：“国用诗、礼、书、乐、孝、悌、养、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治’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除此之外，战国时代还兴起一股“造神运动”，把三皇五帝都说成是神仙，就是后世所说的“历史神话化”。以《山海经》为代表。书中充满了神仙怪异。战国一些方术之士，为了取悦诸侯，便用“神话帝王”作为晋见之礼，以求录用。连秦始皇也被这些骗子弄得痴迷于长生不



老、成仙登天，曾派徐福下海求仙，可惜一去不返。这可能是战国时代疑古思潮的另一背景。连司马迁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写完《史记·五帝本纪》这第一章，发出慨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优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也。”

疑古思潮蔓延到历朝历代，并都有其代表人物。唐刘知几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历代史书及其体例，均提出了自己的评论，均有不同的见解。宋司马光，在其《司马温公文集》中，对古史持怀疑态度。明人李贽，以“异端”自居，他认定《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是当时弟子们的随笔记录，并非无世之至论。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清人阎若璩著《古今伪书考》，崔述著《唐虞考信录》，都对先秦典籍及上古传说进行“辨伪”，宣布《古文尚书》为伪书。

但是历朝历代这些疑古言论和著述，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只是作为一种思潮流行于一时。真正形成学派，对我国的古史研究产生严重影响的，是清末和近代。清末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进步意义的。但他们否定经学，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错误的。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说《六经》不是孔子所著，是西汉刘歆伪造的。甚至说《左传》也是刘歆伪造的。把经学说成是王莽“新学”。“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真正开始出现。”^①

二十世纪初，胡适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康梁的思想理论。他说“中国东周以前无历史”，“中国历史只能从共和元年开始”。他甚至说“诗、书、易、礼、春秋”都是假的，都是刘歆伪造的。这种论调一直影响中国史学界半个多世纪。

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进步意义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新文化运动的

^① 李学勤：《中国古史百年研究》，《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



一些主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极端立场，予以猛烈抨击，许多人和康梁的主张一样，认为中国要想现代化，就必须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口号就是“砸烂孔家店”。他们不懂得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服务，也能够为现代化服务，不顾一切地提出“打倒孔家店”只能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至二十年代初，疑古思潮更形成了学派，以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著《古史辨》，由怀疑古文经学，到怀疑群经诸子，由怀疑儒家传说，到怀疑夏以前的整个古史系统。他说三皇五帝都是春秋战国以后捏造出来的，而且是时间越往后造的帝王越靠前。这就是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论。顾颉刚还著《三皇考》，说“皇帝”二字，在战国以前只是个形容词或付词，或者只指上帝；到了战国末，就变成了人。秦始皇议帝号，博士们便提出了“三皇”的说法……这种思潮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登峰造极，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政治”纠缠在一起，大肆毁弃古代文化。如以“破四旧”为名，收缴焚毁古书，捣毁庙宇，搬走石碑，砸烂神像，将一切文化古迹统统斥之为“牛鬼蛇神”；又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批孔”运动，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最大一次浩劫；直到七十年代末，各地上古帝王陵庙还处于一片废墟状态。未成废墟者，也被机关学校占用，或修盖了民房。进入八十年代，各地才开始在废墟上恢复重建帝王陵庙，才重视保护遗址遗迹。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考古学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仍有学者，在新的形势下还不相信中国有上古史，他们说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不具备确证的资格，必须是当时的纪录才有价值，像甲骨文证实了商朝历史那样。“我们希望考古发掘出有关炎帝的遗物。”对于传颂数千年的尧舜禅让美德，仍有学者加以否定，说“尧舜禅让之说是两汉之际，王莽秉政，刘歆为适应王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将其美化了的东西。”说禅让是出于统治和战争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说当时的社会只能是向“传子制”的奴隶制发展。^①

^① 参看彭庆涛、贾庆超：《三皇五帝考辨》，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中国人如此自毁文明，妄自菲薄，岂能不引起国际上的轻蔑歧视？所以有西方人士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新石器时代！日本人不承认中国有尧、舜、禹。英国人说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商朝开始，因为有殷墟甲骨作了证明。商以前是没有证据的。美国人更说，中国的古代文明只能和美索不达米亚相比，甚至比美索不达米亚还要晚，只能从共和元年写起。^① 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国史部分第一章是“秦汉”。^② 还有的西方人，竟说中华人种也是从西方来的，是从埃及、巴比伦来的。^③ 这话虽然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说的，那时是清朝最黑暗腐败的时候，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认真肃清其影响。

西方人说的是事实吗？绝对不是事实。只须翻一下古埃及史和古巴比伦史即可戳穿其谎言：在公元前 3500 年的时候，埃及人于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埃及王国，史称旧王国。前 2375 年发生内乱之后，底比斯又统一了埃及，史称中王国。至前 1800 年时，希克索斯人灭亡了中王国；至前 1580 年，底比斯王又驱逐希克索思人，重建了埃及帝国；至前 690 年时，又被亚述帝国灭亡；至前 670 年埃及又重建王国；至前 306 年，亚历山大帝国托勒密侵入，埃及又变成托勒密王国；至前 31 年，屋大维又侵入埃及……这样看来，埃及历史至少有三次间断，达五百年之久。即使从公元前 3500 年算起，那时我国的文明历史也已发展了一千二百年，并从未间断。再看巴比伦史：在公元前 3600 年的时候，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苏美尔王国；到前 2872 年时，闪族人从阿拉伯半岛侵入，灭亡了苏美尔王国，建立了拉尔萨王国；到了前 1757 年，汉谟拉比建立了巴比伦王国，才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到了前 729 年，巴比伦就又被亚述帝国灭亡了。看来英美所谓“美索不达米亚”也者，只有一千年历史，

^① 见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见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书之前言，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参看李学勤：《中国古史寻证》。

^③ 参看贾斌论文：《伏羲时代的中华上古文明》，见杨复埃著《太昊伏羲》，上海大学出版社。



只相当于我国的殷商至西周这一段。即使将苏美尔全算在内，也不过是从公元前 3600 年算起，而那时我国的文明史已发展了一千一百年。^①

我们再不能沉默下去了。我们必须丢掉自暴自弃、固步自封的思想，必须改变我们自己认为的“夏以前是传说时代”的观点，认真研究我国夏以前的“三皇五帝”，重建上古史，用研究成果证明我国的文明历史有六千至七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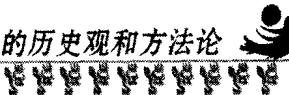
但是在研究与重建中一定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以理服人。要知道，我们宣布的研究成果必须得到世界公认；而世界公认的关键在于证据——过硬的证据！切不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提出一些过头的口号。世界不承认，反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比如近年有的学者提出“我国的文明史有一万年！”可是我们能拿出多少证据说明，在距今一萬年的时候，我国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了呢？又比如：有的学者在反对“中国人来自非洲”的谬论时，却提出了中国人种起源在世界最早的论断。证据呢？是在 1986 年，我国在元谋遗址发掘出了“东方人”的门齿化石，时间是距今 270 万年；又在 1987 年，发掘出了“蝴蝶人”的门齿化石，时间是距今 300 万年至 400 万年；^②但是时过不久就另有学者经过考证，否定了这一结论。原因是证据不足，更不过硬！所以我们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宣布成果，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有过硬的证据，一定要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第二节 正确理解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在重建上古史过程中，还应排除的一个思想障碍是我们自己认为我国夏以前是“传说时代”，认为“传说时代”就不是历史，至

^① 参看李学勤：《中国古史百年研究》，《人文杂志》1997 年第五期。

^② 参看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年版。



少不是信史。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对“神话”和“传说”缺乏正确的理解。

什么是神话？神话就是古代先民由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而形成的传说故事。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天地形成、日出日落、风雨雷电、洪水酷暑等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无法理解，便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这便是神话，所以神话虽非对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但却表现了先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例如：“盘古开天地”这则神话，便是原始先民对天地生成的想象或幻想；“女娲抟土造人”这则神话，则反映了先民对人类起源的想象或幻想；“夸父逐日”反映的是先民对日出日落这种自然现象的探索；“后羿射日”又反映了先民对干旱酷暑的斗争意识。

神话是由古人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而产生的，并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民族部落中的首领人物、英雄人物的崇拜。为什么我国上古帝王都具有“神”的品格？就是由崇拜产生的。崇拜的形式最初是祭祀祈祷、称颂，然后这些对象就都成了“神”。原始先民对他们所惧怕的凶猛动物，对与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动物，也产生崇拜，把这些动物也当成了神，将其图形作为自己部落的标志，这便是图腾。所以说神话虽是人编造的，但都包含了某些历史信息，反映了真实的存在，不可一概斥之为虚妄荒诞。像我国最著名的神话，“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繁衍后代”，就是记载了伏羲时代曾经历过大洪水这一历史事实。西方《圣经》上也有个“亚当夏娃”的故事，说是二人坐在“诺亚方舟”里，躲过了洪水劫难，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样反映了西方也遭遇过大洪水的历史。

什么是“传说”呢？传说系指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对过去事迹的记述和评价。有的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内容，有的则纯属想象；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神话和传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一致之处是都有想象和幻想的成分，但传说大部分是将以前发生过的真人真事，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流传的方法在没有文字的时候是“口耳相传”；在有了文字以后，又将这些